

宗教文化

在祖国的大地上，一说起四大佛教名山，几乎妇孺皆知，而世界文化景观——庐山的宗教文化则更引人入胜。庐山宗教文化的独特性则在于“一山藏六教，走遍天下找不到”，在这座云雾缭绕的灵山中，释道两教从互争雄长走向携手共勉；在这座缥缈的仙山中，移植来了基督教（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四颗具有极强生命力的“文化”，它们在庐山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把庐山变成了宗教的荟萃地，神灵的伊甸园，宗教文化在庐山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是极为显著的。

庐山“道释同尊”。公元四世纪，高僧慧远在庐山建东林寺，首创观像念佛的净土法门，开创中国化佛教，代表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禅师竺道生在庐山精舍，开创“顿悟说”。天师张道陵，一度在庐山修练；道教禅师之一的陆修静，在庐山建简寂观，编撰藏道经 1200 卷，奠定了“道藏”基础，并创立了道教灵宝派。从公元四世纪至十三世纪，庐山宗教兴盛，寺庙、道观一度多至 500 处。1942 年，世界佛教联合大会在庐山召开。本世纪初，二十余国的基督教教会汇集庐山。至今，庐山仍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及教派的寺庙、道观、教堂多座。

东林寺

谈起了庐山的宗教文化，引人注目的佛教场所当数庐山东林寺，东林寺始建于东晋太元十一年（公元 386 年）。由江州刺史桓伊资助，慧远兴建，该寺曾为全国八大道场之一，一度成为全国佛教第二中心，寺中现有“唐经幢”、“护法力士”、“柳公权东林寺残碑”、“李北海东林寺残碑”、“王阳明游东林寺碑”等珍贵文物。古往今来，多少诗人学者，诸如陶渊明、李白、白居易、柳公权、苏轼、黄庭坚、岳飞、陆游、康有为等相继来过东林寺，并在此留下了许多宝贵墨迹和诗篇，堪称江西佛教丛林之冠。使得佛教在庐山出现“钟声长鸣，香烟缭绕”的昌盛时期。

西林寺

坐落于庐山北麓，建于东晋太和二年（公元 376 年）由太府卿陶范创建，为庐山北山第一寺。初是沙门竺昙结庵草舍，死后慧永继承师业。到晋太元二年江州刺史陶范为之立庙，命名为西林寺。自晋至唐一直鼎盛，元为兵焚，明修又毁，此后长期不复。现寺，近年重修，庙宇宏敞，佛像高大，规模不亚当初，别致庄严。庙中，原有一幅墙壁，苏轼来游，看到壁前前人题诗甚多，顿时兴起，索笔《题西林壁》，传为千古佳诗。其中的“不识庐山真面目”一句，极具哲理。

庐山道场

正当佛教在庐山蓬勃兴盛的时候，南朝名道陆修静也来庐山开辟道场，庐山道教由此而

迅速发展。同时也开始了佛、道两家在庐山共争共荣的局面。说起庐山道教的福地洞天，当数庐山仙人洞，其实庐山仙人洞只是一个由砂崖构成的岩石洞，由于大自然的不断风化和山水长期冲刷逐渐形成的天然洞窟，这里不仅是历来最为游人喜爱的胜景，而且是道教的福地洞天。相传唐代名道吕洞宾曾在此洞中修炼，直至成仙，后人为奉祀吕洞宾，将此洞窟更名为仙人洞。洞内有一石制殿阁——纯阳殿，两旁有两副对联：“称师亦称祖，是道仍是儒”，“古洞千年灵异，岳阳三醉神仙”，洞旁苍色的山岩下，依山临壑建有一栋斗拱彩绘，飞檐凌空殿阁，名老君殿，殿为歇山式单层建筑，整个建筑显得庄重而又轻巧，内供太上老君 李聃骑牛雕像。

近现代

庐山历史上有寺庙 360 所，道观 200 余处，使得庐山成为南方的宗教中心。在释、道两教在庐山争雄之际，随着 1858 年九江被强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入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为外国传教士进入九江打开了方便之门。美以、美会、圣公会都属基督教教派，来华始自 19 世纪初叶，登临庐山牯岭则在 1886 年，始作俑者是一位来自英国肯特郡的传教士李德立。1886 年刚到中国，时住汉口的李德立听闻驻汉口的宗教团体涉足庐山，以金钱和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霸占庐山长冲一带，开始了开辟牯岭，传教布道的活动，1895 年至 1920 年间，以李德立为首的基督教势力一时甚嚣尘上，泛滥起来，庐山上仅教堂就有 13 座，教会派别 16 个。每年夏季，基督教传教士云集庐山，常达数百人。这些教会组织或举办讨论会，或开办培训班，或商议教会事宜，或传输宗教信义，或创立学校、医院和慈善机关，将宗教的触角延伸到庐山的每一个角落。

当以李德立为首的基督教势力开始经营牯岭的时候，天主教、东正教势力也接踵而至，闻风而动。

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俄国东正教牧师尼娑盗买到庐山约之塔寺地产——芦林地区，后转租星洲地区，这样，沙俄东正教在星洲租借地区“建房一切布置”随意进行起来，据《庐山志》记载：“俄东正教堂历来侵占界外之地甚多”。东正教在庐山势力甚嚣一时，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苏俄政府一再努力，迫使北洋军阀政府在 1924 年 5 月 31 日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自此，沙俄在华势力灰飞烟灭，庐山东正教势力消弭无形。

法国传教士见英、俄宗教势力蜂拥上山，也迫不及待，加紧涉透，1914 年 9 月，时任统领江西北境六府五教的樊体爱签订租约，在庐山强租土地，获得 77 亩新地，成为樊体爱为首的天主教在庐山扩张的巢穴，期间，天主教在山教会组织不少，有安息会、循道会、伦敦会、雅礼会等 9 个教派，他们以租借地为营地，以教堂为中心，与基督教、东正教势力互为呼应，广为活动，此时的庐山处处游荡着外国宗教势力的幽灵。

采矿区内揭露出竖井 107 口，巷道 20 条，露采坑 7 处，工棚 5 处，选矿场 1 处。出土有石、木、竹、铜、陶、瓷质生产工具和生产用具约 300 余件。主要有石斧、木铲、木铎、木瓢、木槌、木辘轳、木斗、木桶、木扁担、木锄、木斧、竹筐、竹盘、竹篮、竹笠、铜斧、铜铤、铜凿、陶鬲、陶鼎、陶豆、陶罐、陶纺轮、原始青瓷杯、青瓷碗等。

冶炼区揭露炼炉 2 座，储水井 18 口。出土了大量的铜炼渣和陶帛生活用具，主要有鬲、鼎、豆、罐、杯等。从出土陶器分析，时代为东周时期。

铜岭遗址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发现的一处最早采铜冶铜遗址。依据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该遗址开采的最早年代为商代中期，距今约 3300 年，历经西周、春秋以至战国早期。遗迹中出土的陶鬲、陶罐与郑州二里岗上层、蒿城台西遗址早期居住址所出的商代陶器风格相近。该遗址采矿区既保存有坑采区，又保存有露采区，尤其是露采区遗迹的揭露在国内同类遗存中是罕见的。遗址内揭露出的西周时期采用流水分节冲洗选矿大溜槽更是珍贵之物。遗址中出土的商代木辘轳，形制别致，为中国乃至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带式机械实物。出土的西周木锄、木斧亦为中国境内所见最早最完整的实物。

2000 年 5 月，我市邀请国家及省市专家对铜岭古矿冶遗址进行了综合考察，提出了合理开发利用具体方案。本着“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的原则，准备将铜岭矿冶遗址建成集考古、科研、旅游于一体的大型展示园。整个展示园分遗址保护区、宣传展览区、生态资源区、商业饮食区，力争三年初步建成。为了尽快开发铜岭矿冶遗址，国家文物局准备将该遗址列入国家考古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第六章 美食特产

武宁棍子鱼

武宁棍子鱼又叫马头鱼，是一种头大、吻扁、唇厚、有一对胡须的小型鱼类，最大的个体也只能长到 20 多厘米长。它生活在江河湖泊的下层，虽杂食，但偏重觅食动物性食物，如底栖水生物、幼虫等。这种鱼腹腔较小，肠道短，内脏部分比例小，俗话说“只有一根肠”，易于清洁，可食部分比例大。肉质坚实，肌间刺少，味道鲜美，红烧、辣烩都可，是武宁湖区一道特色菜。

据《尚书·禹贡》载云：“珠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峯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嫫珠，暨鱼。”其中的嫫，即蚌之别名。

此后的一千余年中，有关珍珠的记载更是不绝于经传，留传后世的《诗经》、《山海经》、《尔雅》、《管子》、《周易》等，都有对珍珠的描述。据《格致镜原·妆台记》记载，周文王曾用珍珠装饰发髻，这至少说明，中国人用珍珠作装饰的有记载历史可远溯至周朝初始。

自秦汉以来，珍珠饰品更是发展迅猛，《庄子·让王》有云：“今且有人于此，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也。”《淮南子·览冥训》亦云：“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贫。”。我们现代的成语隋侯之珠也就是出之于此。

淡水珍珠和海水珍珠不同在于：前者是无核珍珠，后者是有核珍珠。正因如此，淡水珍珠是作为美容珍珠粉的最好原料。

第七章 历史名人

陶侃

陶侃（259—334），字士行（或作士衡），汉族，本为鄱阳（今江西鄱阳）人，后徙庐江寻阳（今江西九江西）。中国东晋时期名将，大司马。初为县吏，渐至郡守。永嘉五年（311），任武昌太守。建兴元年（313），任荆州刺史。后任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他精勤吏职，不喜饮酒、赌博，为人称道。是我国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的曾祖父。

陶侃是一代名将，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他颇有建树。他出身贫寒，在西晋风云变幻中，竟冲破门阀政治为寒门入仕设置的重重障碍，当上东晋炙手可热的荆州刺史，而颇有治绩。他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晋书》、《世说新语》等史书中，记载着不少有关他的遗闻逸事。他还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赞扬的，贬斥的，以及为他辩诬的人都有。

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孙吴时曾当过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西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斥。